

從五十年代院系調整看 蘇聯對大陸高等教育的影響

• 李 濤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按照社會主義教育理念重塑教育，中共開始着手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其時，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華東區有高等學校八十五所，佔總數227所的37.4%，上海有四十三所，幾佔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的1/5^①。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則很少，1946年的西藏甚至連一所中小學都沒有。全國高等學校發展規模也不平衡，學生總數在三百人以下的有八十二所，三百到五百人的有三十所，而五十人以下的有一百一十二所，佔54.2%^②。同時高校專業結構也很不合理，1949年時文科學生的比重佔到了在校生的33.1%^③。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大規模開展，使國內急需大量各級、各類人才，而當時高等學校已很難適應國家建設對專業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結合大陸經濟建設的需要，對原有高等學校進行調整便成為勢所必然。

1949年時中國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發展規模上都很不平衡，如上海有43所，幾佔全國高校總數227所的1/5；高校專業結構也很不合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大規模開展時，高等學校已很難適應國家建設對專業人才的迫切需要。從1952年起，中共中央決定以蘇聯教育為樣板，對全國高校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

一 五十年代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工作

在新的社會制度確立後，中國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指示，採取「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辦法接收了新解放區的各級、各類公立學校。1950年12月，根據《關於處理接收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的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接管了受外國津貼的二十二所高等學校，並將六十五所私立高等學校全部改為公立。到1952年底時，大陸教育機構中的外國教職員工大多離開了中國，由私人控制的學校都被取消。從1952年起，中共中央決定以蘇聯教育為樣板，以培養「專才」思想為指導，對全國高校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

(一) 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創辦

大陸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第一階段，主要以蘇聯大學教育模式為藍本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期間，即致書斯大林商議共同創辦大學之事^④。按毛澤東的設想，最初準備把這所學校建



1950年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接見與會代表(圖)。在建立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這兩所仿照蘇聯模式的大學的同時，1952年初，全國院系調整工作在京津地區全面展開。全國私立高等院校全部併入公立學校，一些在歷史上頗有名氣的教會大學，如燕京、之江、聖約翰等，最終從中國現代大學名冊中消失。

在莫斯科，以便中國學生了解蘇聯體制及其與資本主義體制的不同^⑥，最後決定設在北京。

1949年12月16日，政務院十一次政務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作出《政務院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決定》指出：「該校教育方針，應是教學與實際聯繫、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⑦1950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作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大學，人民大學以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和政法幹校為基礎，共設教務部、研究部、行政事務部、圖書館四個部門，並在研究部內設編譯室，專門翻譯蘇聯教授所選編的教材。到1959年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培養了3,000多名理論師資，12,000名財經、政法類幹部，被時人譽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在中國的堅強陣地^⑧。

哈爾濱工業大學創辦於1920年，當時叫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用俄語授課。1922年改名為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由中國政府和蘇俄中東鐵路共管。1951年4月29日，新教育部按照劉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哈爾濱工業大學改進計劃」。劉少奇指出：「該校辦學方針和任務是仿效蘇聯工業大學的辦法，培養重工業部門的工程師和國內大學的理工科教師。」^⑨1951年春，以顧林為首的第一批蘇聯專家到校，開展培養研究生，為本科生講課作教學示範工作。在1954年，高教部作出了《關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工作的決定》，指出：「哈工大已基本改造成為採用蘇聯教學制度的新型工業大學。」哈工大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很快在全國理工科高等學校推廣，奠定了大陸理工科高校「高速成批生產」各種專門人才的基本模式。

(二) 全國高等學校的系科調整工作

在建立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這兩所仿照蘇聯高等院校模式的大學的同時，為了加速培養工程技術和科技人才，1952年初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指導下，全國院系調整工作在京津地區全面展開。在近一年的調整過程中，全國共計新設高等學校三十一所；從舊有綜合大學獨立出來各種專門學院

1953年高等學校的系科調整工作結束後，全國的高等院校仍主要集中於少數沿海大城市。1955年初，國務院批准高教部1955至1957年對高等院校的調整方案，將沿海地區一些高等院校的同類專業遷到內地建新校，或將一部分學校的全部或部分遷到內地。通過這次調整，絕大多數省份都有了一所綜合大學和工、農、醫、師範等專門學院。

二十三所；調整後停辦高校四十九所。通過這次調整，全國私立高等院校全部併入公立學校，教師人員、圖書設備全部被統一調配，名稱全被取消。一些在歷史上頗有名氣的教會大學，如燕京大學、齊魯大學、之江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等，最終從中國現代大學名冊中消失。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基本完成〉的社論。全國已有3/4的高等學校完成了系科調整工作。經過調整後全國高等學校的性質和任務較前明確，打下了發展專門學院的基礎，特別是加強了高等工業學校，新設了鋼鐵、地質、礦冶、水利等十二個工業專門學校。在系科調整過程中，教育部門根據國家建設人才的需要及各高校師資設備條件，調整了專業設置。至1953年初，全國高等學校共設專業二百一十五種，其中工科一百零七種、理科十六種、財經十三種、政法兩種。至1953年底，除農林、醫藥系科專業設置尚須繼續調整外，大部分高等學校的調整工作已基本完成。經過這次調整，全國共有高等院校一百八十二所，其中綜合大學十四所、工業院校三十八所、師範院校三十一所、農林院校二十九所、醫學院二十九所、財經院校六所、政法院校四所、語文院校八所（除北京外國語學校外，皆為俄文專科學校）、藝術院校十五所、體育院校四所、少數民族院校三所，另設北京氣象專科學校一所。

1953年是大陸高等教育學習蘇聯、快速發展的一年。全年國家教育投資16,600多億元（舊幣），建設工程量相當於舊中國高等學校五十年建築面積總和的37.74%，達到了102萬平方米。其中北京鋼鐵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哈爾濱醫科大學、華中工學院的校舍都是具有蘇聯風格的新建築。1954年高教部正式宣布，全國高等院校短期內不再輕易調整變動。

（三）全國高等學校的區域布局調整

1953年高等學校的系科調整工作結束後，全國的高等院校仍主要集中於少數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據1955年統計，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廣州等十七個沿海城市共有高等學校九十七所，佔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的50%；有學生159,920人，佔全國高等學校學生總數的61.9%。到1954年，全國新增校舍424萬平方米，沿海地區佔到了總數的61.5%。全國補充教育經費一億元，沿海地區佔到了50%^⑨。為此，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政府的指示，開始計劃像蘇聯30年代高校大搬遷那樣，進行一次全國院校布局大調整，以解決高等學校在地區分布上的不合理布局，達到學校與工業基地相配套的目的。

1955年初，國務院批准高教部1955至1957年對高等院校的調整方案。這次調整力圖改變大陸高校過份集中於沿海大中城市的不合理狀況，具體設想將沿海地區一些高等院校的同類專業遷到內地建新校或加強原有的學校，並將一部分學校的全部或部分遷到內地。計劃三年內遷三所高校、新建十七所高校，改變學校性質一所，撤銷原來校名五所，實際增加十二所。1955年上半年開始，高教部先後從江蘇、浙江、山東、上海、天津、廣東等省市大學調出有關專業遷往內地，在武漢、蘭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建立了測繪、石油、建築、電訊、化工、動力等工業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重慶醫學院、西安交通大學等知名院校都是在這一時期建成的。

1955至1957年的全國高校調整基本上改變了原來不能適應國民經濟建設需要的布局。在全國229所高校中，上海已從1949年的四十三所減少到十九所，而大西北的西安從三所增加到十三所，新疆從一所增加到五所。通過這次調整，大陸絕大多數省份都有了一所綜合大學和工、農、醫、師範等專門學院，為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到1957年底，全國綜合大學由1949年的五十五所減少為四十四所，工學院由二十八所增至三十八所，師範學院從十二所增至三十三所。學校規模也由調整前每校平均700人提高到1957年平均1,926人。全國性的高等院校調整使新中國高等工科教育基本上建成包括機械、電機、土木、化工等專業比較齊備的體系，從而為大陸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經濟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證。

二 從院系調整看蘇聯教育的影響

到1957年全國院系調整工作基本結束時，蘇聯教育模式已經深入影響到了高等教育的各個層面。整體上看，蘇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

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在堅持黨對教育工作政治領導的基礎上，對高等教育實行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教育發展計劃與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緊密相連，國家對高等教育實行壟斷，學生讀書全部免費。簡而言之，這是一種與計劃經濟體制高度契合的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方面，蘇聯教育對大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各級黨團組織及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

1952年10月，教育部在《關於在高等學校有重點地試行政治工作制度的批示》中指出：「要有準備地設立高等學校的政治工作機構，進一步在高等學校中加強政治領導，為全國高等學校的教育事業打下堅強的政治基礎。」在全國範圍院系調整過程中，各院校都配備了各級行政領導幹部以及政治工作幹部。例如西南地區調整後有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兩校設立了政治輔導處，有十五所學校派出了黨員正副校長，有十一所學校派出了黨員正副教務長。該地區高校中黨團員幹部已達到1,118人，平均每校五十五人^⑩。1956年全國四十萬大學生中，已有團員二十三萬人，佔學生總數的57.3%。到1957年時，全國高等學校政治理論課專職教師總數已達5,457人，政治理論課程在高等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逐步固定下來。通過院系調整工作，大陸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⑪。

2、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

蘇聯高等教育的突出特點是對教育實行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國家對高等教育實行壟斷，為此蘇聯的教育官員曾自豪地宣稱，他們可以確切地知道全蘇聯每一個教室在上哪一門課^⑫。大陸在院系調整工作中全面移植了這一堅持

蘇聯高等教育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在堅持共產黨對教育工作政治領導的基礎上，對高等教育實行高度統一的集中計劃管理；教育發展計劃與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緊密相連，國家對高等教育實行壟斷。蘇聯教育官員曾自豪地宣稱，他們可以確切地知道全蘇聯每一個教室在上哪一門課。大陸在院系調整工作中全面移植了這一管理體制。

黨對教育工作領導基礎上的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1953年10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關於修訂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中規定：高等教育部對全國高等學校（軍事學校除外）實施統一領導。綜合大學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與幾個業務部門有關的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為某一業務部門或主要為某一業務部門培養幹部的單科高等學校，如單科性高等工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醫學院、財經學院、政法學院等，可以委託中央有關部門直接管理^⑬。這一《決定》基本確定了高等教育部與中央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管理高等學校的管理體制。

（二）高等院校的教學改革

1952年院系調整的中後期，大陸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心開始轉移到以專業設置為起點的教學改革上。1953年5月，教育部創辦了《高等教育通訊》，作為指導教學、推進教學改革的指導性刊物。在蘇聯專家的大力幫助下，各個學校大力翻譯蘇聯教材、組織引進蘇聯教學大綱，並按照蘇聯高等學校的辦法成立了教學研究組。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中，首先開始的是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工作。

1、統一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培養專門人才

在高等學校中設置專業、按照專業培養對口人才是當時蘇聯大學的經驗。1950年初，《人民教育》發表了教育部副部長曾昭掄〈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問題〉一文，提出了學習蘇聯大學專業設置的設想。在1952年院系調整過程中，教育部根據國家建設對各類專業人才的需要，結合各高等學校師資設備條件，着手制定全國專業設置計劃。至1953年初，全國高等學校共設專業215種，其中工科107種、理科16種^⑭。1954年11月，《高等學校專業目錄分類設置（草案）》出台。該專業目錄明確指出是參考蘇聯大學的專業目錄而制定的。1954年，全國高等學校共參照蘇聯設專業257種。此後大陸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繼續增加，專業口徑進一步狹窄化，到1957年時專業數目增至323種。以有計劃、按比例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理想的蘇聯「專才」教育模式，在這次教學改革中被我們以全面移植的方式照搬到大陸的高等院校。

2、翻譯借用蘇聯教材，逐步自編統一教材

1952年院系調整工作全面展開後，教育部把引進和翻譯蘇聯教材作為教材建設的重點來抓。11月27日，教育部在《關於各高等學校組織翻譯蘇聯教材制定計劃時應注意事項的指示》中指出：「有計劃、有步驟地翻譯蘇聯高等學校教材，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工作。」此後，高教部正式成立教材編審處，作為教材工作的專門辦事機構，負責組織高等學校的教材編譯工作。至1954年底，全國高等學校採用蘇聯教材的課程，在工科902門課程中有338種，理科298門課程中有129種。以湖北省為例，1953年初武漢大學所開出的177門課程中，完全採用蘇聯教材的有三十七門，部分採用蘇聯教材的有三十六門。華中師範學院有五十七門課程採用了蘇聯教材，華中工學院基本上全部採用蘇聯教材^⑮。蘇聯教材的大量使用，使大陸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打下了很深的蘇聯烙印，而蘇聯教材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大陸對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了解和借鑑。

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是按照蘇聯大學專業培養對口人才的經驗。1954年，全國高等學校參照蘇聯設置257種專業，到1957年時增至323種。以有計劃、按比例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理想的蘇聯「專才」教育模式，全面移植到大陸的高等院校。1952年後教育部以譯介蘇聯教材作為教材建設的重點，在一定程度上封閉了大陸對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了解和借鑑。

3、制定與教學計劃配套的、統一的教學大綱

1953年3月13日，高教部部長馬敘倫在《關於目前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中特別強調要「大力翻譯蘇聯高等學校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並參照制訂、編寫我國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⑥。到1954年底，高教部共制定了193種專業的統一教學計劃，修訂教學大綱348種^⑦。截止1955年6月，高等教育部制定頒發統一教學大綱348種，其中工科210種、理科與文科共16種^⑧。在高教部指導下，從1954年到1956年的三年間，全國高校大部分專業都制定了統一的教學大綱。當時大陸制定的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大多脫胎於蘇聯的相應專業。在清華大學1954年開設的388門課中，290門教學大綱是使用蘇聯大學的^⑨。

4、建立基層教學組織，加強教學工作的計劃性

蘇聯高等教育的另一特點是黨委領導下的大學、系、教學研究組的三級管理結構。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計劃(草案)》將院一級行政組織取消，確立了以系為教學行政單位的基本原則。此後，大學內部的基層單位不再是學院，而是系或專業教研室。新設立的系僅為教學行政單位，教研室才是大學的基本教學組織。教研室由主任、副主任、蘇聯科學指導員、主講教員、實習教員、研究生等共同組成，直接進行一門或有密切聯繫的數門課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⑩。國家每年按計劃以各個專業為基本單位分配一定名額的招生計劃，各個教研室分別負責設本專業的教學工作，黨團組織生活在各個專業和教研室中進行。通過教研組的運轉，學校便可以「上下一致、步調統一，像一個現代化的工廠一樣，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學習」^⑪。

此外，建國初期，大陸高等學校在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同時，還在全面模仿蘇聯高等教育有關規章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整套包括教師工作量和工作日制度、生產實習規程、校長負責制、教師聘任進修制、學生學位制度和獎勵制度在內的各項規章制度。上述學習蘇聯經驗而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對於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和促進教學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現了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生搬硬套的偏向。例如在1952至1953學年，有些高校照搬蘇聯「六節一貫制」的經驗，採取了集中排課的辦法，在早午兩餐之間上六節課，影響廣大師生健康、降低了教學效果。高教部於1954年10月糾正了這一做法。

蘇聯高等教育的另一特點是黨委領導下的大學、系、教學研究組的三級管理結構。1952年5月，教育部將院一級行政組織取消，確立了以系為教學行政單位的基本構架。此後，大學內部的基層單位不再是學院，而是系或專業教研室。通過教研組的運轉，學校便可以「上下一致、步調統一，像一個現代化的工廠一樣，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學習」。

三 結 語

綜上所述，50年代的院系調整把教育同政治完全等同起來了。在「原原本本」、「不折不扣」的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教育部頒布的許多法規條例幾乎全是蘇聯的複製品，甚至把學不學蘇聯當作是對「老大哥」政治態度的大是大非問題。在學術和科學領域出現了對蘇聯理論學說片面抬高、對西方學說任意貶低的趨向，乃至於以資產階級唯心學說為由，不允許在課堂講述西方學說的現象。80年代以來，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蘇聯模式的弊端雖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矯正，但仍未徹底根除。

註釋

- ①⑥ 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頁25；3。
- ② 張宗麟：〈關於高等教育的成就和幾個問題的商討〉，《人民日報》，1956年9月4日，第七版。
- ③ 《中國教育年鑑》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 ④ 1949年7月6日，劉少奇在莫斯科寫信給斯大林提出：「我們想請蘇聯政府建立一所專門的學校，它類似於過去的中國勞動大學，來為新中國培養建設和管理國家與企業所必需的幹部。一開始，在這個學校中學習的學生可達1,000名，在這個學校中可設置下列各系：工業、貿易、銀行業務、法學和教育等。……再次，我們希望蘇聯派各個科目的教師到中國來工作，幫助我們在中國培養管理國務活動各部門所需的幹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8」，載列多夫斯基(Andrei M. Leodovskii)著，陳春華、劉存寬譯：《斯大林與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8-19。
- ⑤ 《斯大林與中國》，頁121。
- ⑦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強陣地——中國人民大學〉，《光明日報》，1959年5月22日，第二版。
- ⑧ 李家寶、李春城：〈從哈工大五十年代辦學經驗談當前的教育改革〉，《中國教育報》，1986年3月18日，第三版。
- ⑨⑭⑰ 金鐵寬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上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頁399；181；256。
- ⑩ 邱雁：〈關於1952年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問題〉，《天津師院學報》(天津)，1982年第2期，頁19-20。
- ⑪ 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265。
- ⑫ 謝雪峰：《從全面學蘇到自主選擇——中國高等教育與蘇聯模式》(華中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00)，頁29。
- ⑬ 郝維謙、龍正中編：《高等教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頁95-96。
- ⑮ 湖北教育廳：〈湖北高等教育〉，引自「湖北教育資訊網」(www.e21.edu.cn/zcfg/hb50/02.htm)。
- ⑯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頁75。王明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教育領域在全面學習蘇聯時並沒有全盤照搬蘇聯。蘇聯有一些別的優秀經驗，如高校住房的社會化，我們並沒有學。學蘇聯的教育，我們並非沒有選擇，只是選擇的標準是政治化而非學術化的。」見王明傑：〈在五十年代學習蘇聯經驗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教育史研究》，1998年第2期，頁8。
- ⑰ 高教部文件〈在高等工業院校、綜合大學校院長會上的發言〉(1955年6月11日)，轉引自《高等教育史》，頁103。
- ⑱ 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233。
- ⑳ 新華社：〈新國家的新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介紹〉，《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0日，第三版。
- ㉑ 何戊雙：〈中國人民大學「系」的工作〉，《人民教育》(北京)，1952年第2期，頁33。

李 濤 男，1972年生，陝西長安人。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浙江行政學院省情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早期現代化及中外教育交流研究。